

燕山人文学者



丛

刘邦凡 朱广荣 李尊实 主编

清代通鉴学研究

王彦霞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燕山人文学者论丛

刘邦凡 朱广荣 李笃实 主编

清代通鉴学研究

王彦霞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自问世后，历代学者或续或补，或改或注，或考或评，衍生出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著作群，形成专门的学问——“通鉴学”。清代通鉴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无论在著作数量、记载范围，还是在编撰体例、史料考辨与史学思想方面，均取得新的发展。本书通过对清代通鉴学五大类型著作的考察，以具体说明其在历史文献学和史学史上的贡献。本书形成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的自身逻辑思路，并且持续到宋元时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山人文学者论丛/刘邦凡，朱广荣，李尊实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12

ISBN 7-80208-465-2

I. 燕… II. 刘…朱…李…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704 号

书 名：燕山人文学者论丛·清代通鉴学研究

主 编：刘邦凡 朱广荣 李尊实

著 者：王彦霞

责任编辑：曼 曼

封面设计：贾浩楠 三叶草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二号 邮 编：100733

电 话：(010) 6536952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秦皇岛银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00 1/16 印 张：180

字 数：2790 千字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书 号：ISBN 7-80208-465-2/I. 056 总定价：320.00 元

《燕山人文学者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尊实、孔令富

委员：郭祥俊、韩兆柱、惠吉兴、孔令富、李福亮、李龙海、李玉杰、李尊实、刘邦凡、刘芳玲、刘立霞、曼熳、沈晓梅、石敦国、王清学、王新华、王玉荣、吴勇、谢中起、余子新、张鸿石、张向前、张忠义、周立文、朱广荣（以姓名拼音升序排序）

主 编：刘邦凡、朱广荣、李尊实

副 主 编：孔令富、吴勇、张忠义、石敦国

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范式 大力推进我院学术研究

(代总序)

举凡进行认真、持续的学术讨论与思考，都需要一定智慧模式作指导，尽管我们有时是不自觉地使用，但可以肯定地说，脱离智慧模式的指导，不可能写出系统的学术论著。选择何种智慧模式，就是在具体的学术活动中选择了何种研究范式。一种智慧模式就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评价观和目的论。而研究范式 (paradigm)，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是指研究者所假定、接受和采用的基本信念、概念、模式、理论架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特定的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据以提出或建构特定的研究对象，并对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资料数据进行评判、分析、解释、概括的理论框架。

当今流行于世的研究范式有不同的分类。也许最为人们熟知的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按时间与流行的程度分为：主流范式（包括：实证主义及其继承）和非主流范式（包括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从本体论而言：实证主义是朴素的现实主义，主张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后实证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主张现实也许是客观存在的，只能部分地被认识；批判理论是历史现实主义，主张现实是历史性演变而形成的；建构主义是相对主义，主张现实是人们建构的。从认识论而言：实证主义是二元论客观主义，认为研究结果是客观真理；后实证主义是修正的二元论式客观主义，认为研究结果也许是客观真理；批判理论是交往的、客观的认识论，认为研究结果受价值观念制约；建构主义是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认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真理，研究结果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从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是实验主义的技术唯上的方法论，主张假设证实、量化分析优先；后实证主义是修正的实验主义的技术为的方法论，主张假设证伪、多元方法；批判理论是一种对话的、辩证的方法论；建构主义是一种阐释的、辩证的方法论。从学术研究的评价观而言，实证主义以效度、信度、推广度为主要标杆，后实证主义追求逼真性、可靠性、彻底性、整体性和可理解性，批判理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开放性，建构主义则力求实现解释力度、信息丰富性和复杂精巧性。从研究目的而言，实证主义以发现真理、认识客观现实为目的，后实证主义以寻找可能存在的现实、使认识不断逼近现实为目的，批判理论以研究与被研究者在互动中获得“解放”为目的，建构主义以实现研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为目的。

另一种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照的研究范式，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存在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强大、运用广泛的思维框架和思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并论证过的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成为常见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本身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范式。不论是接受还是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入研究现场或研究课题之前都不能不首先确定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关系。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在特定的场景下提出的具体而细微的分析结论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迁而削弱其针对性，但其中那些属于探求一般规律和宏观分析的核心成分以及在具体分析中所体现的方法论精髓却历久弥新，成为人类知识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至今具有深刻的影响。

我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重要性和指导性有深刻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组织和开展我院学术研究时，特别强调我院同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力求实现在进行学术讨论与思考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这不仅是我们时代的需要，而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我院是一个年轻的学院，2001年才成立学院，在学校支持下经过全体教师的努力，时至今日，我院由1个本科专业发展到7个本科专业，硕士点从无到有，今天已经增加到9个，学科专业涵盖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学，教师从30多人增加到近140人，学生由几十人到1500人，不论是规模、层次还是数量、内涵，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比较于国内高校同类型兄弟院系的发展，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深层内涵来看，我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教师学术素养还停留在应付教学的状态中，科学创新和学术实践的热情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学术推动平台还有相当的差距：没有博士点，没有一级学科硕士点，二级学科硕士点布局单一。为实现在这两方面有一定的突破，我们号召全体教师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范式，大力进行学术研究，为学院下一步发展贡献力量。总之，我院通过几年的建设与发展，从学院规模上看，已经像一个大学学院，但从学术研究与学术影响来看，我们才刚起步。借学校发展文科的东风，我院启动教授、博士的专著出版工程，组织编写系列学术研究丛书，一方面，希望能推动我院学科建设的步伐，实现我院从教学型学院向教学研究型学院转型；另一方面，希望能把我院教授、博士们的学术观点介绍给更多的人，扩大我院的学术影响。

编入本丛书的著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院教师的博士论文，二是我院

教授、副教授多年学术探讨的心得之作。

在我院建立之初，当时的院长吴勇教授就有借助出版著作来推动学院学术发展的想法，但迫于经费没有着落，也就只有设想而已。2006年，学校要大力发展文科，给了我院13万元经费，借助这笔经费，我们多年的愿望得以初步实现。但是，做什么事情，都难。做集体的事，就更难。好在这项工作得到学院全体教师的大力支持，才使得这项工作不至于中途夭折。

本丛书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各位领导、首席策划曼曼女士以及我院兼职教授、台海出版社总编辑周立文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燕山大学学校领导特别是李尊实副书记、孔令富校长助理的关心和指导，李尊实副书记还直接参与了丛书的选题、编辑与修改等具体工作，同时也得到了燕山大学文科建设委员会、科技处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意。同时，我们希望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这套丛书能够继续下去，在今后几年之内，再推出几套有特色的学术文丛，进一步推进我院的学术研究。

为该丛书的编辑，我院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石敦国博士具体实施，尽管花费了我们不少精力，但我院是首次组织编辑出版系列著作，经验不多，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借此系列丛书出版之际，祝贺我院建院五周年，祝愿我院学科发展更上一层楼，祝愿我院成为燕山大学文科发展的强势学院！

刘邦凡，2006-12-20

自序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司马光《资治通鉴》史学影响深远，历代学者或仿其体例对史事进行续补，或补其体例之不足进行改作，或释其内容进行注释与考辨，或择其史事进行评论，衍生出一系列与《通鉴》有关的著作群，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通鉴学”。在《通鉴》问世的宋朝，通鉴学已颇有规模。元、明、清三代又各有发展，堪称显学。但目前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研究。张煦侯先生《通鉴学》虽开当代通鉴学系统研究之先河，但张著的研究重点更在于《资治通鉴》著作本身。本论文的写作，以期填补当下学术界的这一研究空白。由于在京师求学的三年时光有限，我仅择取了清代通鉴学作断代研究。对通鉴学进行通代的研究，还有待日后学术的积累和拓殖。

这也是我出版的第一部书。在确定论文出版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面对它——因为它是母亲牺牲天伦之乐支持我读博换来的。母亲是在我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后不久，确诊为不治之症的。面对这一噩耗，我曾想放弃北上读书，陪侍在母亲身旁。然而，母亲的坚强与坚持，使我下决心远行读书。三年来，母亲“轻松地”承担着一一次次地化疗，更是默默地一次次与死神抗争。然而，三年的博士生活，让母亲等得太久，母亲累了，她等不及了。就在我博士毕业的前夕，母亲病情危重。在我来到这所渤海之滨的大学工作不久，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面对命运，我懊恼过、沮丧过。然而，母亲坚韧的性格和为了实现儿女理想甘愿承担一切、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却无法让我停歇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踏实地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王彦霞

2006年11月27日凌晨于燕大

目 录

自 序	I
绪 论	1
一、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及意义	1
二、清代通鉴学研究的概况	4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方法	6
四、本课题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7
第一章 清代通鉴学的产生和发展	10
一、清代通鉴学的产生背景	10
(一) 明清社会鼎革与历史资鉴	10
(二) “刚柔相济, 宽猛并用” 的文化政策	14
(三) 清代通鉴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17
二、清代通鉴学的发展轨迹	22
(一) 清初通鉴学: 反思与开拓的气象	22
(二) 乾嘉时期的通鉴学: 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	25
(三) 道咸以后的通鉴学: 多元化的发展	26
第二章 清代的通鉴学续作	30
一、清代通鉴学续作的特点	30
(一) 著作卷帙浩繁、内容丰富	30
(二) 体例更严谨、叙事更灵活	32
二、宏编巨帙——《续资治通鉴》	37
(一) 《续资治通鉴》的编撰与流传	37
(二) 后来居上的通鉴学续作	41
三、明史专著——《明通鉴》	54

(一) 夏燮与《明通鉴》的编撰	54
(二) 《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56
第三章 清代的通鉴学改作	70
一、清代通鉴学改作的重要支脉——“纲鉴”类史书.....	72
(一) 明代通俗史学的余波	72
(二) 清代“纲鉴”类史书的特征	74
二、清高宗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78
(一)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修撰	79
(二)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撰目的	81
(三)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史学特点	84
三、通俗史学的典范——《纲鉴易知录》	88
(一) 吴乘权主编《纲鉴易知录》	88
(二) 《纲鉴易知录》的编撰特点和影响	91
第四章 清代通鉴学的注释与考辨	99
一、清代通鉴学注释考辨的总成就	99
(一) 重训释考实的清代通鉴学注释工作	100
(二) 求真求实的清代通鉴学考辨工作	102
(三) 清代通鉴学注释考辨工作的特点	108
二、集各家注释之大成——王应鲸《朱子通鉴纲目注义》	113
(一) 王应鲸及《朱子通鉴纲目注义》的编撰.....	113
(二) 《朱子通鉴纲目注义》的注释内容和方法.....	115
(三) 《朱子通鉴纲目注义》的注释特点与价值.....	122
三、通鉴学之乾嘉考据——钱大昕《通鉴注辨正》	125
(一) 钱大昕与《通鉴注辨正》	125
(二) 《通鉴注辨正》的考辨内容与方法	126

(三)《通鉴注辨正》之乾嘉考据特点	136
第五章 清代通鉴学的史论	142
一、绚丽丰富的史论著作	142
(一)清代通鉴学史论的著述体例	142
(二)清代通鉴学史论著作的总成就	143
(三)清代通鉴学史论的特点与贡献	146
二、中国古代史论的高峰——王夫之《读通鉴论》	159
(一)王夫之与《读通鉴论》	160
(二)《读通鉴论》——王夫之理想的封建社会构图	161
(三)《读通鉴论》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影响	169
结语：清代通鉴学的史学贡献	180
主要参考文献	185
后 记	193

绪 论

一、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及意义

(一) 以清代通鉴学为研究对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自宋问世后,影响巨大,宋、元、明、清至今代学者或续或补,或改或注,或考或评,衍生出一系列与《资治通鉴》有关的著作群,从而形成专门的学问——“通鉴学”。不同时代的“通鉴学”有不同的学术积累、不同的学术价值和时代特点。清代通鉴学成果丰富,又因其处在古代学术和近代学术的交汇之处,具有承前启后的许多时代特征,因而本课题选择清代通鉴学作为研究对象。

清代通鉴学在宋、元、明三代通鉴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承袭前代成果的同时,又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新的发展。它产生于满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一方面封建经济因外族的入侵而被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焕发了生机,创造了“康乾盛世”。清代通鉴学因此而表现出特有的恢宏气势;一方面封建制度的腐朽也尽现世人眼底,清代的知识分子或清醒地对封建社会进行犀利彻底地批判,或顽固地进行消极庇护。清代通鉴学又因此而表现为或激进,或保守的学术倾向。总之,清代通鉴学具有继承与开拓的特征。

清代通鉴学的研究范围是产生于清代与《通鉴》有关联的各类史学著作,包括对《通鉴》的续补、改作、注释、考辨和评论五个方面。这是通鉴学自产生以来发展的五个基本途径,但无论在著作数量、记事范围上,还是在编撰体例和史学思想上,清代通鉴学均在前代通鉴学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

(二)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1. 了解清代通鉴学的成就,进而认识清代史学的成就

清代通鉴学不仅著作数量众多,包括续作类 8 部、改作类 17 部、注释类 4 部、考辨类 13 部、史论类 15 部,共约 57 种,而且内容丰富,既有接续《通鉴》记宋、元史事的通史,又有接续《通鉴》只记明朝史事的断代史。在历史记载上,清代通鉴学体现了通鉴体史书对于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在编撰体例上,清代通鉴

学于纪年、叙事方法等多有改进和创新。就史学思想而言,清代通鉴学史论范围广泛,既探讨天人关系、古今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分析民族政策、君主素养、地理条件等具体理论问题。

此外,清代通鉴学承继明中期以来兴起的通俗史学的潮流,“纲鉴”类史书繁盛。它使史学不再是统治者和上层文人的专利品,开始为普通大众所接受。这为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直到今天,纲鉴体通俗读本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在普及史学知识方面仍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清代通鉴学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然而以往的文献学史、史学史、学术史著作皆未能给予认真地归纳和总结。因而,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重大缺陷。

2. 揭示清代通鉴学对宋、元、明三代历史研究的作用

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后,模仿其体例续宋、元史事者,历代不乏其人。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体例几依《通鉴》。此后,元代有陈桱《通鉴续编》、明代有王宗沐、薛应旂各自撰述的《宋元资治通鉴》。但诸书或年月参差,事迹脱落,或表彰理学,疏谬殊甚¹。同时,三书“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纪事年月,甚为荒陋。”²所以明朝胡应麟感叹:“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间有续者数家而弗能详也。”³

至清代,徐乾学著《资治通鉴后编》,取材已较陈、王、薛各本丰富,“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尤其徐氏时领清一统志局,“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又得到几位著名学问家,如万斯同,胡渭、阎若璩等的协助,“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⁴。其他如元末之事,多采明人史著,遂使徐书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大超过了陈、王、薛诸书。

毕沅时,宋元佚书已陆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中最重要的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这两书在徐乾学编纂《资治通鉴后编》时前者未见,后者是残本。可以说,此时毕沅修续鉴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是徐乾学时所无法比拟的。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在客观条件成熟以及主观努力下,将宋、辽、金、元史融为一体,虽仍以政事部分为多,但必要的经济、文化

¹ 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卷四七.资治通鉴后编

² (清)章学诚.章氏遗书[M].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³ (明)胡应麟.史书占毕一[M]

⁴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卷四七.资治通鉴后编

及对外关系，也都一一记录，可以说它才是宋元时代一部真正的编年史。

在明史研究中，晚清夏燮《明通鉴》成就突出。夏氏以《明实录》、《明史》、《通鉴纲目三编》资料为主，参考《明会典》、《一统志》及稗官野史、明人著作数百种，编为是书，详记有明一代史事。

除上述几部重要著作外，清代通鉴学还有不少史书对宋、元、明三代历史研究有重要贡献。通鉴学的续补类和改作类几乎全部都是对宋、元、明史事的记载和补充，注释和考辨类也多涉及三代历史，清人又以考据见长，因此研究宋、元、明三代历史时，就不能不注意清代通鉴学的成果。

3. 总结清代通鉴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清代通鉴学成就斐然，不是偶然的。它在承袭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开辟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就清代通鉴学的续补、改作、注释、考辨和评论五个方面而言，它们直接承袭了宋、元、明三代通鉴学发展的基本途径。但就每个方面来讲，清代通鉴学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在体例上，编年史体例日臻完善。毕沅《续资治通鉴》摈弃了以前诸鉴尊宋抑元、详南略北的诸多弊病，而将宋、辽、金、元史等而视之，正因此才真正具有了宋元编年史的性质。夏燮《明通鉴》将有明一代历史分为《明前纪》、《明纪》及《附编》三大部分，《附编》6卷专门记述南明史事。这在明史研究和编纂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除此之外，清代通鉴学以《资治通鉴》中的人物评价为中心而作《通鉴评语》，对《资治通鉴》载言不载事而改作《纲鉴择语》，对《通鉴》和《续通鉴》重新分门别类而成《通鉴类纂》，都对通鉴学的编纂体例和研究方法有启发和开拓意义。

在内容上，清代通鉴学更加丰富精细。毕沅《续通鉴》虽然仍以政事部分为多，但必要的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也都加以记录，避免了《资治通鉴》只重政事的过偏之病，阅此而能综览宋、元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另外，齐召南《明鉴前纪》和王先谦《蒙古通鉴长编》，前者缩小了记事时间的范围，后者则集中记事的空间和时间，这也使记事相对详尽和精细。

除了上述创新之外，清代通鉴学还产生了丰富的史论和考辨著作。在我国古代史学领域里，虽不乏史论著作，但都是片断的、不系统的。清代通鉴学续补类、改作类、注释类和考辨类著作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就符合这一特点，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需要后人来整理总结。但清代通鉴学的史论则不同，15部著作均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史学思想不仅丰富而且系统。而在形式上，清代通鉴史论

则广泛地使用和发展了笔记体这种灵活的体裁形式。王夫之《读通鉴论》是其杰出代表。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它卓著的考辨成果表现在通鉴学上，是产生了一批通鉴考辨力作。钱大昕著《通鉴注辨正》最能体现清代这一学术特点，它运用多种考据方法对《通鉴》进行了极为精细地考辨。

当然，清代通鉴学在研究方法和途径探索上有成就，也有失误，对其加以总结，将便于史学工作者取其之长，避其之短，使史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少走弯路。

二、清代通鉴学研究的概况

清代通鉴学目前的研究状况还相当薄弱，以清代通鉴学为研究课题的专著还没有，至少尚未出版。但对它的研究已开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些史学史著作对于清代通鉴学有所涉及，但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他们在涉及“通鉴学”时，或简单笼统地提到这一学问的产生和发展概况，如宋衍申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或只涉及“通鉴学”在某一朝代的发展概况；或仅对某部或某类通鉴学著作进行研究和评价。如对于王夫之《读通鉴论》、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夏燮《明通鉴》和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等清代通鉴学著作，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张孟伦《中国史学史》、施丁《中国史学简史》和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等史学史著作均有或多或少的论及。而对于清代通鉴学成就整体的把握和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有涉及。

在史学史著作涉及的清代通鉴学各类著作中，以对通鉴学续作的论述为多，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和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均属此类。少数史学史著作涉及到考辨类通鉴史著，如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二卷）在论述《通鉴胡注》时，提到赵绍祖《通鉴注商》、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和钱大昕《通鉴注辨正》。

其二，在个案研究中，对王夫之《读通鉴论》的研究成果最多。早在民国二年（1913），就有胡思敬著《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对于王书两汉三国部分的史论进行辨正。1982年李季平著《王夫之与读通鉴论》¹，对王夫之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粗线条勾勒，主要涉及王夫之爱国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主张四方面的内容。1991年宋小庄著《读〈读通鉴论〉》²，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

¹ 李季平. 王夫之与读通鉴论 [M]. 杭州: 杭州西泠出版社, 1982

² 宋小庄. 读读通鉴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历史观、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九个方面对王夫之《读通鉴论》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可为精深细致,是研究《读通鉴论》的力作,但本书在王夫之学术思想纵向联系和撰述宗旨方面关注还不够。

除研究《读通鉴论》的专著之外,学术界还刊发了许多论文,从民族观、历史观、经济观和政治观等方面,对王夫之《读通鉴论》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专门研究王夫之《读通鉴论》的论文就有近 30 篇,涉及《读通鉴论》的论文更不胜数。但由于王夫之《读通鉴论》蕴含的学术思想精深博大,仅从某一角度对其进行准确地立论决非易事。目前对于《读通鉴论》的学术研究就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偏颇,而缺乏对著作全面、整体地把握。另一方面,只有将《读通鉴论》放在明清之际具体的社会历史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够对王夫之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是目前研究需努力的方向。

其三,对宏篇巨帙《续资治通鉴》的研究。《续资治通鉴》是诸续鉴中最好的一种,这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然目前的研究,却与它的学术地位极不相称。不但没有专著出版,论文也甚为寥寥,仅有 6 篇。其中《〈续资治通鉴〉西夏史事点校疑误举隅》和《〈续资治通鉴〉讹误考校举例》两篇对《续资治通鉴》的讹误进行了校勘和订正,均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另有湖北大学黄忠怀的硕士学位论文《毕沅整理研究古文献的主要成就》涉及了《续资治通鉴》的编撰过程。另外三篇均为王继光所撰,对《续资治通鉴》的撰修成书和版本流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分析了毕氏《续鉴》优于以往续鉴的原因。《续资治通鉴》是宏篇巨帙,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还有待于不断深入地研究和挖掘。

其四,对《纲鉴易知录》的研究。数百年来,《纲鉴易知录》不仅为初学历史者所喜,也受到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史籍编纂者的重视,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史书。这绝非偶然,自然有它内容、体例的优势和特点。而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已有的 6 篇论文,仅初步涉及了本书的内容、体例和史学价值。在肯定其史学影响的同时,学术界对其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多持否定态度,这似乎完全忽略了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应辩证地对待。

其五,对夏燮《明通鉴》的研究。《明通鉴》不仅是私人编著的一部明史,且是一部首尾完备的明史,因而在史学界地位特殊,影响颇大。而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仅有 6 篇论文。其中 2 篇还是在与《国榷》进行比较研究和对夏燮的史学进行述评时,顺便谈到《明通鉴》。另外 4 篇,有的从文字记载上订正《明通鉴》的讹误;有的探讨《明通鉴·考异》的学术价值;唯有袁英光的《夏燮与〈明通鉴〉研究》对夏燮和《明通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了《明

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体例、学术思想和史学价值。但限于篇幅，有些问题的讨论仍比较粗略。

此外，还有一两篇论文论及到《通鉴注商》和《明鉴》。这与它们自身的学术价值完全不相称，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综上所述，不论是史学史著作，还是个案研究，对清代通鉴学著作的探讨基本上都涉及了体例体裁、材料来源、思想内容和史学价值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已为清代通鉴学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能全面系统地总结清代通鉴学的成就和史学贡献。二是就个案研究而言，许多重要著作还未涉及。本课题的构思正是为了填补这些研究空白而展开考察和研究的。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方法

（一）研究目的

清代通鉴学在宋、元、明三代通鉴学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论在著作数量、记事内容上，还是在史学思想上，清代通鉴学均取得了新的发展。面对数量庞大的著作群，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综合考察、分类研究和个案分析总结清代通鉴学的整体成就，分析清代通鉴学的发展特点，揭示清代通鉴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各类型代表性著作的学术价值，为 21 世纪史学的新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

1. 以唯物辩证史观为理论指导

清代通鉴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的产物，同时清代通鉴学的丰硕成果也离不开学者的主观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考察分析问题，从具体的历史矛盾运动中找原因。

清代通鉴学著作数量丰富，种类齐全，史学价值也颇高，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需辩证地对待这一成果，汲其精华，去其糟粕。

2. 整体把握和典型分析相结合

本课题旨在从整体上把握清代通鉴学的发展概况，揭示清代通鉴学的发展特